

经济评论

简 报

2012 年第 6 期

《经济评论》编辑部

2012 年 12 月 30 日

编者按

1. 公共健康支出、私人健康投资与经济增长.....张芬 周浩 邹薇
2. 内部人控制、国企分红机制安排和政府收入.....钱雪松 孔东民
3. 房地产借贷、金融加速器和经济波动.....郑忠华 邸俊鹏
4. 教育使人幸福吗?金江 何立华
5. 收入分配对我国居民总消费的影响分析.....王宋涛 吴超林
6. 中国所有制结构变迁中的劳动力流动.....代谦 田相辉
7. 寻求薪酬激励之外的国有企业高管激励机制.....于文超 李任玉 何勤英
8. 国外技术溢出内生与吸收能力的动态特征.....张建清 孙元元
9. 改革开放三十年外商直接投资生产率溢出变化趋势.....徐宏毅 蔡萌 赵迎红
10. TPP 成立与扩张给亚太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何种影响?朱润东
11. 中国应对美中经常账户失衡的战略选择.....陈继勇 郭夏杰
12. 中国在亚洲的贸易市场由谁主导?肖光恩 陆诗婧 王娟
13. 工业化中期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研究述评.....李卓 邹雨洋
14. 我国技术进步路径及方式选择的研究述评.....余泳泽
15. 技术会影响经济周期吗?潘维军
16. 经济波动福利效应的研究脉络.....丁志帆 孙根紧
17. 降低企业税收负担, 我们应从何做起?吴祖光 万迪昉

《经济评论》简介

编者按

理论一旦为社会大众所掌握,就能焕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为充分发挥经济学研究在经世致用、咨政育人、服务实践方面的功能,以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影响社会精英、影响社会民众,我们决定向《光明日报》、《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文摘报刊以及网站经济频道等大众传媒,编辑出版《经济评论》简报。

大体而言,经济类文章不外乎三种类型:(1)运用经济学的前沿理论和方法,以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从事经济学专业研究的同行阅读的文章,目的在于探索和研究社会经济;(2)运用经济学理论,以非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决策者看的文章,目的在于通过影响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思维而改造社会经济;(3)运用经济学知识,以非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社会大众阅读的文章,目的在于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经济生活。《经济评论》简报就是要把第一类(学术论文)转化、简写为第二、第三类文章。凡在《经济评论》上刊发的论文,均由作者改写成1000—1500字的简写稿,以非专业方式表达作者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学术洞察与学术思想。

简报文章以原文为基础而改写,兼顾现实性、学术性和可读性。虽是改写,但我们要求文章自成一体,力求以生动的笔调、浅显的案例娓娓道出作者的学术思想,让非专业读者了解社会经济现象,帮助他们思考经济问题,进而获得思想启迪。因此,简报语言平实生动,说理深入浅出,文章简洁明快,尽量避免专业性很强的理论概念、数理模型及其推演、数据表格、专业注释等。阐述观点、研究结论或提出政策建议时,没有罗列大量数据,但有关键的数据或事实支撑。

学术期刊研究成果的社会化、大众化和通俗化是理论服务实践的一项积极探索。我们相信,经过学界同仁的辛勤耕耘,《经济评论》简报将成为一个雅俗共赏的精神园地:既有学术的严谨性、又有表述的生动性,既有理论的逻辑力量、又有实践的事实力量,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现实的感染力,从而使《经济评论》在注重学术品位、不断提升学术水准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学术成果的社会影响,更广泛地服务社会经济建设、服务社会精英和人民群众。

《经济评论》编辑部

经济理论探索

1. 公共健康支出、私人健康投资与经济增长

张芬（武汉大学）、周浩（暨南大学）、邹薇（武汉大学），《经济评论》2012年第6期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公共医疗支出的绝对数及其占各国 GDP 的比值保持持续稳定增长。而且一般而言，在一些经济较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健康支出由政府承担的比重相对较大。这就引起人们思考：是否只有当政府财力壮大了之后，才应该、也更有能力提供更好的公共健康服务？发达国家之所以经济发展水平高，是否由于国民健康状况更好、人力资本水平更高？但是，对南太平洋地区的图卢瓦和所罗门群岛等国公共健康状况的调查同时表明，这些国家几乎全民免费的医疗保险并没有带来经济的后续发展，它们依然属于世界上最穷国家之列。如果说健康人力资本是对经济发展的促进要素之一，为什么南太平洋地区的这些穷国依然没有摆脱贫困？在一国经济发展由贫致富、国民健康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公共健康支出应该保持什么样的比重，这是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

分析结果表明：（1）资本产出份额越大，健康人力资本的折旧速度越慢，经济体的稳态值越高。而且，外生的技术参数和税率水平的变化具有经济增长的水平效应。（2）经济发展存在着门槛限制。在经济发展的低水平阶段，储蓄中物质资本所占份额相对越大，或者健康投资中公共投资所占比重小都不利于经济体突破门槛条件。而在较高发展阶段，沿平衡增长路径，政府应适当减少对公共健康投资的融资，释放经济体中私人部门的投资活力，以实现稳态时更高的人均资本存量水平和产出水平。（3）在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促进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有利于经济发展。

因而，尽管南太平洋地区的图卢瓦和所罗门群岛等国几乎实现了全民免费医疗，但是由于该地区经济体尚处于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经济发展的瓶颈约束尚未解除，而且技术水平低下，因而无法实现经济的动态稳定增长。而反观具有高收入水平的欧美国家和地区，其公共健康支出虽然远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但 2007 年欧洲地区公共健康支出占总健康支出的比值为 76%，美洲地区平均为 47.2%，距离全民完全免费的医疗保险制度还相差甚远，尤其是美国现有的医疗保险体制还广为诟病。但是欧美尤其是美国在科技发展方面一直具有全球领先地位，多年来经济发展也相对稳定。尽管如此，在当前复杂的世界经济环境格局下，这些国家和地区无一例外采取缩小政府规模和公共支出、减税等措施来刺激经济增长。

这一分析对处于发展中国家、且内部发展不均衡的中国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纵向而言，虽然从经济总量上看，中国目前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 GDP 仅为日本 1/10，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尚处于发展的较低阶段。因而，在促进国民健康改善的举措上，总体上还是应以政府公共健康投资为主，私人健康投资为辅。这也

论证了当前“全民医保”举措和针对贫困地区儿童营养补助计划的合理性。横向来看,考虑到中国国内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相对悬殊的经济实力差异,中央财政在确定公共健康投资的投向时,应优先选择经济落后地区和贫困的农村地区,确保这些地区更好的发展起点和平台,通过中央财政对健康的投资,促进这些地区物质资本的形成,帮助其早日突破经济发展的瓶颈条件,通过后进地区的经济发展来缓解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同时,对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则应通过减税来刺激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力,以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此外,在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政府都应采取鼓励技术创新和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政策措施。

2. 内部人控制、国企分红机制安排和政府收入

钱雪松 孔东民(华中科技大学),《经济评论》2012年第6期

国有企业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调整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题。改革开放以来,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收统支到利润留存、再到利改税和承包责任制,我国尝试了很多形式,但效果不好。1994年政府实施的“税利分流”制度确定了国企和国家之间利益关系的基调。然而,1994-2006年,虽然国企创造了大量利润,但大多数国企都未向国家分红。2007年底,财政部和国资委正式实施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但理论实务界对分红比例制定、红利收入处置等问题的争议不断。在经济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大背景下,如何分割国企利润、怎样使用红利收入等问题已经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本质上看,国企是否向国家分红、支付多少红利等决策是管理者根据经营状况、发展前景等信息自主制定的,因而红利支付具有很大灵活性。国企内部人既可以通过提高员工福利待遇、运用留存收益再投资等机制转移利润,也可以通过享受宽松惬意工作来减少利润。这样一来,内部人控制使得国家分割国企利润问题变得异常复杂。基于代理模型的理论分析表明,政府强制国企按照一定比例分红会对国企内部人的利润转移行为产生作用。其一,强制分红减少了国企管理者控制的自由现金流量,这倾向于降低其私人收益,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国企内部人会加大利润转移力度,从此视角看,政府红利收入与分红比例呈现倒u型关系,为了增加红利收入,一味提高国企分红比例不可行。其二,实施国企分红引入了红利征收使用部门等利益相关者,它们有激励完善公司治理,从而遏制了国企内部人的利润转移行为,从此视角看,公司治理体制越完善、有效性越高,政府能够在抬高分红比例的同时保障国企利润水平,从而政府的红利收入能力越强。

内部人控制背景下强制分红引发了复杂的激励和信息问题,因而相关制度设计至关重要,在我国现行国企分红实践中,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

第一,国企应该向财政部还是国资委分红?此时关键是红利征收部门监管国企运营和缓解内部人控制问题的能力。虽然财政部拥有“负责审核和汇总编制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制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制度和办法”的权力,但国资委掌握了国企的人事任免、收入分配和资产运用监管等重要权力。与财政部相比,国资委不仅在国企资产运用、盈利能力、

投资机会好坏、企业内部人不良行为等方面具有信息优势，而且其拥有的实际控制权使其更有能力应对并处置国企内部人转移利润、选择不良投资项目等不当行为。因而，与财政部征收国企红利相比，国资委征收能更有效遏制内部人控制问题，从而得到较高红利收入。

第二，应由财政部负责处置红利收入将其用于教育、医疗等民生支出，还是由国资委主导处置将其用于国有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等国企自身用途？此时关键是红利流向及其激励效应。与财政部主导将国企红利收入导出国有企业体系不同，后者相当于在国企之间构建了一个内部资本市场，国资委在国企之间配置红利收入不仅会引发搭便车激励（即国企期望通过国资委主导的内部资本配置分割其他国企的红利收入，因而有动机让其他国企多缴纳红利而自己坐享其成），而且会导致针对红利收入配置的寻租行为，从而造成租金耗散的不良后果。因而，与财政部处置相比，国资委支配红利收入会加剧国企内部人的利润转移行为、减少政府红利收入。

因而，为了进一步完善国企分红实践，应着力做好以下两点：一是设计合理有效的制度，赋予国资委征收国企红利的权力，所得红利收入一部分由国资委支配以调动其征收和监管积极性，另一部分由财政部配置以导出富余资金，降低国企内部资本市场引发的搭便车激励和寻租行为；二是根据国企公司治理现状制定恰当的分红比例，避免盲目提高分红比例导致的内部人加剧利润转移、政府红利收入下降的后果。

3. 房地产借贷、金融加速器和经济波动——一个贝叶斯估计的 DSGE 模拟研究 郑忠华（天津工业大学）、邱俊鹏（南开大学），《经济评论》2012 年第 6 期

长期以来房地产一直为宏观经济研究所忽略（Iacoviello, 2010）。直到近几年，学者们才开始注重房地产在宏观经济中的地位。但是现有研究忽视了房地产作为消费品、投资品、抵押品的多重作用。我们从房地产的多重属性入手，构造一个包含多个经济主体的 DSGE 模型，从金融加速器机制视角分析房地产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

模型中包括企业家、存储型家户、借贷型家户、资本生产企业、金融机构、零售商、中央银行六个主体。存储型家户和借贷型家户通过劳动获得收入，满足自己的消费和房屋需要，储蓄型家户能将自己多余收入存入银行，借贷型家户通过借贷满足自己对房地产消费的需要。企业家利用资本、房地产作为投入，雇佣家户所提供的劳动生产中间品，在出售中间品后，付给储蓄型家户和借贷型家户工资，剩余利润满足自己的当期消费和下一期投资需求。企业和借贷型家户向银行借款，企业的借贷利率是随着其自身资产状况而变动的，借贷型家户的借款利率随着借贷量而变化。资本生产企业专门生产物资资本，以供企业生产使用。零售商把企业生产的产品经加成定价后销售。中央银行则在经济中对利率进行调控。经济中的外部冲击包括：技术进步冲击、房地产偏好的冲击、通胀冲击、财政支出冲击、利率冲击。其中房地产偏好冲击是对于房地产的刚性需求的分析，其余冲击分别表示技术进步、通货膨胀、财政支出增加、利率变动对经济的影响。

我们用 Matlab 软件分析这一模型。利用 1998 年 1 季度到 2010 年 4 季度的 GDP、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居民存款余额、政府财政支出的数据，对其先用 H-P 滤波的方法剔除趋势因素，然后进行季节调整，再取对数，用处理过的数据对模型中的参数进行估计。为了保证模型对数据的稳定性，把数据列中前 10 个数据抛弃，模拟重复计算 3000 次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技术冲击。在金融加速器机制下，技术进步对企业的影响时间短，波动剧烈，对于普通家户影响幅度小，但波动时间更长，技术进步对于储蓄家户福利增加要优于借贷家户。

第二，偏好冲击。偏好冲击引起了投资增加，说明企业在观察到房地产需求增加后，提高投资，但是房价的上涨使其投资受到了抑制，企业于是减少了借贷，使其从借贷者变为了存款者，偏好冲击对房地产存量、产出、投资等变量有短期刺激作用，但对经济稳定和长期的增长则极为不利。

第三，通胀冲击。通胀冲击发生后，储蓄型家户减少存款，说明贷款大量流向家户。房地产从生产领域退出成为普通家户购买的对象。由于经济中通胀的风险增加，房地产作为经济中保值增值的重要资产，通胀在提高了价格水平的同时，也使得产出、消费、投资、资本存量、房地产价格、金融的存贷款等诸多变量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通胀冲击成为经济中最大的威胁。

第四，财政政策冲击。财政冲击使得房地产价格下跌，财富效应使得储蓄型家户消费降低程度要强于借贷型家户，冲击对于企业的影响要优于对普通家户的影响，企业从财政支出中获得了收益，普通家户的消费、房地产消费下降，福利受到损害。政府的财政支出有利于企业而对普通家户不利。

第五，从方差分解中我们发现，通胀冲击是我国利率因素和房价变动的主要原因，货币供给总量决定了通胀，并对利率和房价产生很大影响。影响产出和投资最重要的因素是名义基准利率和通胀，而这两者也是影响房地产价格的主要因素，这再次说明中国的房地产业和经济波动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中国经济研究

4. 教育使人幸福吗？

金江（中山大学）、何立华（中南民族大学），《经济评论》2012年第6期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古时人们推崇这一观念，主要原因在于求学是一条主要的社会上升通道。但是，在当今中国，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推行，有机会享受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高等教育的私人投资比例越来越高，相应的教育回报却不断下降。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1999年大学以上群体教育收益率（通俗理解即为教育回报率）为13.75%，2000年大学专科和本科的教育收益率分别为9.97%和13.1%，2004年大专以上群体的教育收益率为4.18%，这说明更高的学历并不一定能改善人们的收入状况。

然而，时下中国却展现出另一番景象，“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的口号经久不息，家长们依然十分重视教育，并在教育上投资不菲。在教育投资成本不断上升和教育的经济回报不断下降的情形下，应当如何理解中国居民的教育投资行为？如果单从教育的经济回报这一角度思考该问题，显然不能为我们提供有说服力的依据。

作为人类发展的终极目的，幸福一直是人们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从教育促进人类发展和提升个人能力的功能而言，其最终意义或许不在于人们收入水平的改善，而在于给人创造一种幸福的生活。但是，丘吉尔曾指出，“只有傻子才是幸福的”，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经常提及“傻人有傻福”这一俗语，似乎又暗含着学历越高并不能使人们更幸福。真实的情景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的研究表明，尽管教育并不一定改善人们的经济地位，但确实是改善人们幸福水平的有效手段。无论是通过学历还是受教育年限衡量教育程度，教育水平越高人们的幸福感也越强。这一结论说明，教育的功能不仅在于它能够作为改善我们经济地位和收入水平的一种手段，同时也能够给我们创造消费性价值，即舒尔茨所说的“学校教育的价值就在于它能造福于人”，享受教育的过程本身能够给人带来心理满足感，使人成为“懂礼仪知廉耻”的道德君子。

除此之外，值得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教育如何影响人们的幸福感？我们认为，教育的价值包括生产性价值和消费性价值，生产性价值体现在作为一项投资活动，教育能改善人们的谋生能力和收入水平，为我们带来货币性收益，消费性价值指教育的非货币性回报，这种回报在当下给人带来满足，进而增进人们的幸福感。教育对居民幸福水平的影响是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不同的途径而发挥作用的，一方面不仅直接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另一方面还能通过改善个体在其他物质（如收入）和非物质方面（如健康）的特征而间接提升其主观幸福感水平。

教育对幸福的积极影响说明近年来我国政府在实行九年义务教育、扩大高等院校招生规模等方面的努力和改革，对于改善人们的幸福状况是有效的。但由于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

扩张使得教育的投资成本与收益并不对等,因此政府需进一步加大对高等教育的公共投资力度,降低高等教育的私人投资成本。从教育与收入的关系来看,收入仍是改善我国居民幸福状况的重要手段,发达国家的经验又表明,收入水平往往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提高。但是,由于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够完善,受教育程度越高并不意味着就能获得与其学历相匹配的工作和收入。因此,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解除限制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制度障碍,通过提升教育的收益率水平而改善人们的幸福状况。

5.收入分配对我国居民总消费的影响分析——基于边际消费倾向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王宋涛(华南师范大学)、吴超林(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市场经济研究中心),
《经济评论》2012年第6期

当前,总需求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与经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的总需求不足源于消费需求不足,而消费需求不足则主要由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所致。数据显示,我国最终消费率从2000年就持续下降,而居民消费率则从2000年的43.6%持续下降到2010年的33.8%,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与经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居民消费率相对较低。

我国居民消费率的下降,除了居民收入比重下降的原因之外,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也被认为是主要的原因。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1997年的0.28上升到2010年的0.40,而城乡居民收入比则从1997年的0.25上升到0.32。那么,收入差距对居民总消费的影响有多大?收入差距如何影响居民总消费?

由于国内收入分配指标(基尼系数)的难获得性以及回归分析方法的局限性,直接使用基尼系数和居民总消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来研究收入差距对居民总消费影响可行性不高。通过分析居民微观消费函数特征,给出收入差距影响居民总消费的理论条件,并利用数据对该理论条件进行判断,可以间接判断收入差距对总消费的影响。

实际上,凯恩斯就指出:当个体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时,缩小收入差距可以提高总消费。由于凯恩斯没有对此进行彻底证明,后续学者对该命题的证明也不彻底,导致有国内学者认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不能保证缩小收入差距能提高总消费”,该命题的错误在于其利用线性消费函数定义“边际消费倾向”;而我们要指出:对边际消费倾向进行比较,必然蕴含了消费函数的非线性性质。实际上,“边际消费倾向”应该定义为消费函数的一次导数,其跟消费函数的具体形式并没有关系。在该定义下,使用离散的扩展二人模型,容易证明:当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时,缩小收入差距可以提高总消费;进一步还可以证明,当边际消费倾向非单调递减时,缩小收入差距不一定可以提高总消费,这意味着边际消费倾向的其他特征都不能保证收入差距能提高总消费。

那么,边际消费倾向是否递减呢?这需要根据具体消费函数进行判定,而消费函数的推

导则依赖于个体的效用函数。如果考虑财富效应,则有消费效用函数和财富效应函数,基于个体最优决策可以推导唯一的消费函数。由于收入、价格、利率以及制度等变量都会影响个体的消费效应或财富效应,从而这些变量也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消费函数变量)。利用我国的数据对居民消费函数的估计表明,我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这表明收入差距扩大会降低居民总消费,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进一步的数据回归分析表明:基尼系数对我国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系数达-0.823,也即1997-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导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了9.9个百分点。

因此,政府和社会必须致力于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但能够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也可以提高总消费,扩大国内总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6. 中国所有制结构变迁中的劳动力流动

代谦 田相辉(武汉大学),《经济评论》2012年第6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产业结构的变迁、经济地理的演变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在这种变迁中,以非公有制经济的兴起为主要特征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则是这种演变的核心。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很难从公有制部门内部和政府部门获得发展的资源,而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意味着公有制经济对资源的垄断被打破,意味着非公有制经济能够在体制外获得自身发展所必需的经济资源,意味着经济资源在不同所有制部门间的重新配置。进一步说,中国劳动力流动反映了中国所有制改革的变迁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各种所有制部门吸纳就业的能力和发展趋势,因此对劳动力流动的考察就不能够忽略所有制结构因素,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实际上决定了中国劳动力的基本流向,即劳动力资源在各部门间的配置。

对劳动力在不同所有制部门间的流动系数严谨科学地计算,是我们评估劳动力流动背后所有制结构变迁因素的第一步。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修正后的城乡各种所有制企业就业数据,我们构造了一个严格的计算方法,利用现有成系统的时间序列数据,测算了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制部门间劳动力流动系数。计算表明: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流向城市。但是,城镇公有制部门对农村劳动力都是封闭的,城镇民营经济部门是农村劳动力最主要的吸纳部门。

第二,乡镇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的兴起,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伴随着乡镇企业的衰落,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在9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进入21世纪10年代后半期才缓慢开始上升。

第三,城镇现代企业部门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非常有限,这一部门主要吸纳了城镇公有制部门释放的劳动力,成为城镇公有制部门冗员的主要流向部门。

第四,城镇公有制部门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后半期释放了大量的劳动力;但是进入21世纪,公有制部门改革减缓,劳动力释放越来越少;这一变化与中国的国有企

业改革进程紧密联系。

第五,从计算结果来看,外来投资部门对劳动力的吸纳一直非常有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虽然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但是对外经济活动的背后是国内非公有制企业的兴起,并不是依靠外来企业完成的。

总之,劳动力在不同所有制部门间的流动与中国所有制改革进程紧密联系。

7. 寻求薪酬激励之外的国有企业高管激励机制

于文超 李任玉 何勤英 (西南财经大学)

《国有企业高管参政议政、政治激励与过度投资》,《经济评论》2012年第6期

近年来,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问题成为一个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天价薪酬”、“旱涝保收”等词语所描述的国有企业高管薪酬过高、薪酬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促使公众对改革高管薪酬体系的呼声日渐强烈。不可否认,改革国企薪酬体系尤其是垄断性国企的高管薪酬体系已成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程中不能回避的重要一环。然而,对于“国企高管该不该高薪”这一问题,支持者与反对者的意见相左甚至针锋相对。我们是否可以跳出薪酬体系改革的纷争,进而寻求另外一种国企高管激励机制?

众所周知,国有企业高管中普遍存在着“商而优则仕”的现象,国企高管能够通过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良好表现获得晋升而进入政府部门,那么,这样的政治激励会对国有企业经营决策产生怎样的影响?根据《中国经济周刊》统计,截止2012年2月28日,有156名A股上市公司高管参加了2012年的“两会”,其中有78名高管来自国有上市公司,所占比重达50%。我们以国企高管参政议政这一普遍现象为切入点,探究了政治激励机制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理论上而言,外部政府干预与内部代理问题是导致国有上市公司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的两种重要途径,高管参政议政会通过这两种途径对企业过度投资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高管参政议政体现的是国有企业高管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为帮助地方政府实现一系列社会性目标(如地区经济增长、税收增加、就业稳定),国有企业使用自由现金流进行过度投资是一种重要途径。另一方面,高管参政议政体现的是政治激励,获得参政议政的机会,既是对企业高管出色经营能力和突出贡献的充分肯定,也为高管日后的职位升迁创造了更多机会。这将充分调动国企高管的工作积极性,减轻公司内部的代理问题,降低国有企业的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水平。

通过对以2004-2009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在控制公司规模、股权集中度、管理层持股比例等因素之后,无论是高管参政议政还是制度环境的改善,都能显著降低公司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水平。与此同时,在制度环境越差的地区,高管参政议政与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之间的负向关系越强。可见,国有企业高管参政议政体现了政治激励的作用,在制度环境不甚完善的地区,这种政治激励往往更能促使企业高管提高自身努力水平,减轻企业代理问题。上述实证发现不仅深化了我们对国有企业高管参政议政这一现象的认

识,更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现阶段,改革国企高管的薪酬体系既要顾及普通民众的感情诉求,又要保证薪酬制度能够发挥保障与激励的作用,充分调动高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这无疑是一种“两难选择”。为此,我们更需寻求一种薪酬激励之外的国企高管激励机制。给予国企高管更多参政议政的机会,通过政治评价肯定其经营管理能力,进而为其日后政治升迁提供更多机会,有效发挥政治激励的作用,显然是未来国企改革的有益选择。

8. 国外技术溢出内生与吸收能力的动态特征

张建清 孙元元(武汉大学),《经济评论》2012年第6期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已为人所熟知,虽然全球研发活动主要集中于经济发达国家,新技术的产生和新产品的研发也主要集中于这些国家,但是新的技术和新的产品会不断通过 FDI 和贸易扩散到其他国家,进而带动全球经济的共同增长。对于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由国际间技术扩散而获得的技术占其国内技术存量的较大一部分,可见技术落后国家的技术进步、技术差距的缩小以及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间的技术扩散。虽然 FDI 和贸易都是国外技术扩散的重要渠道,但是进口先进的技术装备,进而吸收经济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知识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亚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

进口贸易对技术进步的作用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既可以直接促进技术进步,也可以通过相关要素提高本国企业对外来技术的吸收和利用能力,可见一国对外来技术的吸收能力是国际贸易技术扩散的重要因素,而吸收能力又与国内的研发能力、人力资本水平、市场化水平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要素紧密相关。更加有意义的是分析国内研发和人力资本对进口品所含技术吸收利用能力的动态演变,以及制度改善和经济发展促进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动态效应,而且由于在不同的技术发展阶段,一个国家或地区对不同类型国外技术的吸收可能还存在区别,所以还有必要分析人力资本、国内研发、市场制度以及经济发展对初级产品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作用与工业制成品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作用之间的异同及其可能的作用机制。

经验分析的结果表明,中国总的进口贸易、进口的初级产品以及进口的工业制成品都存在显著的技术溢出,并且进口的工业制成品的技术溢出效应要大于进口的初级产品的技术溢出效应。对于总的进口贸易而言,当国内研发水平较低时,国内研发对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吸收存在递减效应,只有当国内研发水平超过某个门槛值,国内研发的增加对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促进作用才会逐步增强,即国内研发对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影响类似于一个正 U 型结构;而人力资本对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影响而言,呈现出一种倒 U 型结构;对于市场制度而言,随着市场化水平的逐步提升,其对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促进效应会越来越大;不过经济发展水平对总的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并无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对初级产品进口贸易技术溢出和工业制成品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影响有所差异。

而且值得关注的是,国内研发的门槛性只是体现在吸收工业制成品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即吸收技术含量越高的进口品,对国内研发能力的要求也越高,人力资本对国外技术溢

出的吸收更多体现在吸收技术含量较高进口品的技术溢出,这也与常识相符合,即越是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它的吸收利用对其自身的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水平的要求也会越高。同时经济发展水平只有超过某个门槛值,才会有利于进口的工业制成品的技术溢出,即对于进口的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它的技术溢出对经济发展水平的要求会更高,其实反映的是对国内研发能力、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市场制度的要求更高。

由此可见,由于在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过程中,进口的工业制成品的技术溢出效应要大于进口的初级产品的技术溢出效应,故而应该积极扩大技术含量较高产品的进口,对于进口技术含量较高产品的企业,可以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还应积极鼓励企业加大对研发的投入,政府自身也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各种科研机构,同时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以保证进口的高新技术产品所含的先进技术可以真正为中国所吸收;由于国内的研发活动主要集中于国有大中型企业和科研机构,所以应该推进这些国有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市场化改革,进而利用市场机制激励它们充分发挥其具有的研发潜力,为吸收利用拥有较高技术含量进口品的技术溢出创造制度条件。

9. 改革开放三十年外商直接投资生产率溢出变化趋势

徐宏毅 蔡萌 赵迎红 (武汉理工大学)

《基于元回归分析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生产率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经济评论》2012年第6期

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由于全球经济动荡,欧债危机,2011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量超过了危机前的均值,达到了1.5万亿美元,但仍然比2007年的峰值低约23%。2011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为1160.11亿美元,而2012年的初步统计为1100美元,下降了约5个百分点。

为梳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的生产率溢出效率变化的趋势,我们试图运用Meta回归方法,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相互独立的31篇国内外研究论文、75份结论,时间跨度为1979-2008年,通过定量分析具有共同研究问题——FDI溢出——而溢出结果不一致的不同研究之间的共性,通过整合这些相互独立的研究,以期形成有关中国FDI溢出趋势性、规律性的研究结论,从定量的角度对FDI溢出的两大争论起因进行分析,并对研究结果的差异性做出解释。

学者们围绕外商直接投资(FDI)是否对东道国有正溢出、是否与国家性质有关、是行业内溢出还是垂直溢出等问题开展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目前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争论。

争论一:是否存在溢出?溢出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还是经济发达国家?凯伍兹(Caves, 1974)率先开展了FDI溢出的实证研究,其研究对象为两个西方发达国家——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结论是两个国家的制造业FDI行业内溢出均表现为正。布罗斯托姆(Blomström, 1983)对墨西哥、可可(Kokko, 1996)对乌拉圭的截面数据研究的结果是FDI溢出效应不

显著。斯特罗布尔 (Strobl, 2001) 对 21 篇 FDI 溢出的代表性论文进行了元分析, 其中正溢出为 13 篇 (62%), 负溢出为 4 篇 (19%), 统计不显著有 4 篇 (19%)。

争论二: 溢出是水平溢出还是垂直溢出? 赫希曼 (Hirschman, 1958) 最早提出了后向关联概念, 此后, 这一概念常被用来度量 FDI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加娃西卡 (Javorcik, 2004) 验证了转型经济体立陶宛制造业 FDI 的后向关联对生产率有较显著的正溢出, 前向关联和行业内溢出不显著, 并由此分析了埃特金 (Aitken, 1999) 的负溢出结论在于关联问题。汉挪斯卡 (Hanousek, 2010) 的研究表明, 后向关联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确实是获得经济发达国家技术外溢的一种重要途径。

从文献分析可知, 争论的主要源头是数据、模型与研究方法等的不同。斯特罗布尔 (Strobl, 2001) 认为研究设计、方法和数据以及不同的 FDI 测度指标是导致当前 FDI 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FDI 研究的初期数据多为时间序列或截面数据。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 随着研究方法的改进, 面板数据已成为主流。自 FDI 溢出问题提出以来, 国内外关于中国 FDI 溢出的实证研究十分丰富, 但由于数据来源、地区差异、行业、模型、时间、研究方法的不同, 导致研究结果没有呈现趋同或收敛的趋势, 这也反映出上述所分析的两大争论。

针对上述两大争论, 我们设计了四大类变量 (包含 16 个虚拟变量), 构建了 8 个元回归模型, 研究结果表明: (1) FDI 的代理变量对 FDI 溢出效应测度有着重要的影响。随着 FDI 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选择合适的 FDI 代理变量是十分重要的。(2) R&D 有着显著的正溢出效应, 这意味着中国政府与企业应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 以提高 FDI 的溢出效应。(3) 垂直溢出和服务业 FDI 有着更高的溢出效应, 这也验证了加娃西卡 (Javorcik, 2004) 的研究结论: 后向关联对生产率有较显著的正溢出, 而水平溢出不显著。这一结论的启示是, 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 FDI 重点制造业上下游行业发展的引导政策力度, 并应加快现代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产业如金融业、物流业、信息技术等行业的发展, 从而有力地推动相关制造业的进一步增长。(4) 我国 FDI 溢出效应十年来呈现下降趋势。从时间跨度变量考量, 由于其回归参数呈现负值, 表明随着世界范围对外资吸引政策力度的不断加大, 竞争日趋激烈, 研究结果揭示了国内的 FDI 溢出效应呈逐年下降趋势。(5) 模型结果表明技术差距与 FDI 溢出呈负相关性。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 国内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 技术差距的不断缩小有利于吸引 FDI, 并获得较高的溢出效应。

世界经济研究

10. TPP 成立与扩张给亚太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何种影响？

朱润东（华侨大学）

《TPP 扩张过程中的福利收益分配趋势分析——基于时空数列模型的探讨》，
《经济评论》2012 年第 6 期

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 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TPP）于 2006 年 5 月正式生效，是一项涵盖货物贸易、原产地规则、关税手续、贸易救济、技术性贸易壁垒、战略合作、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政府采购和竞争政策等广泛议题的自由贸易协定。TPP 从建立之初的四个小国，历经多次扩张。截止 2012 年 11 月，其成员已达到 10 国，分别为新西兰、新加坡、文莱、智利、美国、秘鲁、澳大利亚、越南、马来西亚和墨西哥。随着 TPP 的不断扩张，TPP 的总体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同时，其所包含的福利收益份额也随之迅速扩大，TPP 扩张过程中的福利收益大小和分配状况成为了值得研究的问题之一。

有关 TPP 经济收益的分析着重于对美国加入后产生的经济利益分配的分析；对于其非经济收益的分析则着重于定性分析美国加入 TPP 给亚太区域政治格局的影响。而有关全局性描绘 TPP 扩张（而非仅仅美国的加入）对于亚太各国（地区）总体收益的影响是研究的着眼点。运用时空数列分析方法，笔者具体测算 TPP 扩张过程中各成员和区外代表性国家（地区）经济与非经济福利收益的分配状况，以群落为单位，分析群落间差异性特征和成员在各群落间迁移的时空演变状况，希望以此揭示 TPP 福利收益分配状况的演变趋势。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各国经济领域福利收益分配的群落分布和总福利收益分配的群落分布是不一样的。经济环境的地缘位置差异的确引起了经济领域福利收益增长的集群差异，而加上政治与社会文化领域的地缘差异，总福利收益增长又呈现新的集群效应。TPP 的成立和每次扩张都在改变 11 国（或地区）在经济或非经济领域的地缘差异，从而改变了各国的集群分类状况。在没有引入 TPP 冲击变量组时，11 国（或地区）在 2005 年后的群落分类状况是不稳定的，而在引入 TPP 冲击变量组后，群落分类状况变得稳定了。福利地图显示的 11 国（或地区）福利收益增长率在 TPP 成立与扩张过程中各自呈现出三种不同的趋势和一个特例。三种不同趋势分别是：TPP 区域内国家聚合于同一群落之中而产生的福利收益加速增长的趋势、TPP 区域外部分国家未受影响而保持福利收益稳定不变的趋势和区域外另一部分国家受到负面影响而使福利收益不断降低的趋势。一个特例是美国在加入 TPP 后，福利收益增长率有所上升，其中非经济领域的福利收益占总福利收益的大半，而其他国家经济收益是总福利收益的主要贡献力量。三个不同趋势和一个特例所构成的四种群落与之前的群落分类状况相当吻合，这表明之前认为 TPP 的扩张过程和集群分类之间可能存在相关关系的假设是成立的，同时也表明时空数列模型对于模拟福利收益分配的演变过程，展现演变过程的

趋势和特点是比较有效且直观的。

11. 中国应对美中经常账户失衡的战略选择

陈继勇 郭夏杰（武汉大学）

《美中经常账户的失衡与测度研究》，《经济评论》2012年第6期

全球经济失衡是当前复杂的宏观经济问题，是指一国拥有大量贸易赤字，而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主要集中在其他一些国家的现象。当前全球经济的失衡主要体现在美国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之间的经常项目失衡。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全球经济一直以一种持续失衡的状态运行着，轻微的经济失衡是经济发展的常态。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09年欧债危机的双重影响下，世界经济陷入衰退。随着2011年欧债危机的再度升级，更加引发人们对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担忧。在此严峻形势之下，世界各国纷纷致力于研究世界经济再平衡动力和路径，以推动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失衡的重要一方，正在努力探索世界经济失衡的机制，尤其是美中经常账户失衡的内外因素、世界经济失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中国应采取的战略对策。

面对美中经常账户的严重失衡，中国扩大内需迫在眉睫。受金融危机影响，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总需求持续下降。中国作为依托出口导向型的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的发展将受到极大限制。美中经常账户失衡的调整，增强了中国扩大内需的紧迫性和战略性。同时，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势在必行。以大量出口原材料和低技术含量的廉价产品的贸易发展方式，使中国的贸易形势在当前全球经济失衡下愈加严峻。在国际能源资源价格不断上涨与剧烈波动的情况下，粗放型的产业发展方式使中国面临严峻的能源安全。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美国的金融优势是美中经常账户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元资产的强流动性、美国成熟的金融市场以及优越的投资环境，大量吸引着包括中国在内多国的资本流入，美国进而利用回流的资本对中国进行FDI等高效益的投资，加剧了美中经常账户的失衡。美中经常账户失衡的调整，对中国金融业的创新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何解决当前世界经济的严重失衡，关键在于如何协调解决美国与中国等亚洲国家间的经常项目失衡。我们认为，中国应采取以下战略措施：

一是改革收入分配机制，努力扩大内需。首先，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居民实际消费能力；其次，发挥财政刺激作用，加强居民直接受益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医疗保障体系建设，为居民消费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最后，放宽信贷限制，增加小微贷款，促进国民消费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二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努力提高国内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新能源、新材料等行业关键技术的核心竞争力；同时，调整贸易和发展战略，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大对国外先进技术和高科技设备的引进，尤其是注重对国外高效利用能源资源技术的学习，降低出口产品的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提高出口

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三是推进金融创新,提高金融业国际竞争力。鼓励突破实体经济发展瓶颈领域的融资难题,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社会发展共生共荣;构建门类齐全、分工合理、高效安全的金融体系,筹集和引导社会资金,更多支持长期建设;完善制度、法律、市场监管等配套建设,破解各种体制制约,为金融创新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序推进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

四是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稳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中国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所处位置的先决条件,中国应遵循渐进、稳步和可控的原则,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和企业应科学地提高应对浮动汇率制下外汇风险的管理能力。

12 中国在亚洲的贸易市场由谁主导? .

肖光恩 陆诗婧 王娟(武汉大学)

《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进出口贸易非均衡依赖关系的经验事实分析——基于 VAR 模型的实证检验》,《经济评论》2012 年第 6 期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中国经济近十几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特别是在亚洲贸易市场中,中国日益成为亚洲各国重要的贸易伙伴。2007 年中国大陆首次超越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国,同时,中国大陆超越日本成为韩国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随后也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亚洲主要经济体对中国的贸易依赖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中国在亚洲的出口贸易市场中,2000-2011 年中国香港、日本、韩国也始终处在前 3 位,而中国在亚洲的进口贸易市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始终处在前 3 位。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在亚洲的贸易联系与依赖不断增强。

2012 年 9 月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开始启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朝向制度化进程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目前,中日韩三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五分之一,近年来中日韩三国的贸易和投资活动日趋频繁,生产联系显著加强,经贸合作成效显著,三国间贸易额从 1999 年的 1300 多亿美元增至 2011 年的 6900 多亿美元,增长了 4.31 倍。若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成,它将成为一个人口超过 15 亿的大自由贸易市场,并将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然而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地区进出口贸易有关系并不对称。是谁主导了中国在亚洲的贸易市场呢?

中国在亚洲的出口市场类似于一个垄断竞争的市场,2000-2011 年中国香港、日本和韩国占中国大陆在亚洲出口市场的份额超过了 55%,并在 60%左右波动。尽管如此,中国大陆向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的出口贸易关系并不均衡,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对这种非均衡的出口贸易关系进行识别后发现:中国大陆向日本和中国香港的出口贸易行为会正向地影响中国大陆向韩国的当期出口贸易行为,而中国大陆向韩国的前期出口行为只会负向地影响中国

大陆向日本当期的出口贸易行为;中国大陆向日本和韩国的前期出口贸易行为并不会影响中国大陆向中国香港的当期出口贸易行为;而且中国大陆对日本和中国香港的出口贸易冲击对中国大陆对韩国出口贸易行为的影响是长期稳定的,具有单向性。当然,中国大陆向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的当期出口贸易行为都会受自身前期出口贸易行为的影响。

中国在亚洲的进口市场却类似于一个竞争市场,2000-2011年间,虽然日本是中国在亚洲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但韩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中国香港在中国亚洲进口市场中的地位却在不断地交替变换,而且日本在中国亚洲进口贸易中的比重在2000-2011年间却持续下降。同样采用向量自回归分析方法对中国大陆从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的进口贸易关系进行识别后发现:中国大陆从中国香港的进口贸易行为会影响到中国大陆从韩国和日本的当期进口贸易行为,而中国大陆从日本和韩国的进口贸易行为之间似乎并不存在相互溢出效应或相互影响,尽管中国大陆从日本和韩国的进口贸易行为具有很高的相关性。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中国大陆可能通过中国香港的转口贸易从日本和韩国进口一些高科技产品,因此,中国大陆从中国香港的进口行为会显著地影响到中国大陆从日本和韩国的当期进口行为,即中国大陆通过中国香港转口贸易把中国大陆从日本和韩国的进口贸易关联起来。

总之,日本和韩国是中国大陆在亚洲的重要出口市场,在一程度上能左右或支配中国在亚洲的出口市场,但中国大陆对日本和韩国的出口依赖关系在不断下降,而且这种出口依赖关系是单向的。其次,中国大陆已经成为日本和韩国最重要的出口贸易伙伴,在一定程度上却能左右或支配日本和韩国的出口贸易,但是中国大陆从日本和韩国的进口贸易行为却只受中国大陆从中国香港的进口贸易的影响,这说明日本和韩国对中国大陆的出口贸易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中国香港对中国大陆的出口贸易行为。

理论前沿动态

13. 工业化中期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研究述评

李卓 邹雨洋（武汉大学）

《工业化中期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文献综述》，《经济评论》2012 年第 6 期

中国总体上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这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外学者围绕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展开积极讨论。概括地说，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是没有完全照搬“华盛顿共识”，重蹈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覆辙。中国的市场化改革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式，政府干预在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引入市场经济体制、对经济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和利用了政府干预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与发展战略仍处在不断摸索中。

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国内对“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关注重点与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发展问题研究的重点相似，中国在总结和借鉴国内外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应该采取不同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以维持经济的稳健增长。国内外大量的研究均建议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加强技术创新等策略来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与此同时，解决工业化中期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探索工业化中期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及政策措施，需要在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同时发挥政府调节与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更多地倚重技术创新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其中，是否选择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将决定政府干预和技术创新的成功与否以及成本大小。

现有的研究基于“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关系角度，显示了如下一些研究共识：针对现阶段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中国应该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注重政府调节与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协调关系，借助技术进步与创新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以解决发展中遭遇的瓶颈问题。一方面，政府应保持一种既“超然”又“融入”的状态，在“融入”的同时又不能被“捕获”，为此政府要采取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鼓励和引导企业根据自身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并把相关政策与战略措施的重点定位于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等具体活动和过程上。由此，政府发挥了干预市场的积极作用，同时企业也能获得竞争力。另一方面，进行技术进步与创新活动，应该基于自身的要素禀赋结构，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从而降低“潮涌现象”和产能过剩的发生概率，减少政府因扶植和补贴本国技术进步与创新活动所带来的成本，降低引进技术的成本，更好地发挥技术进步与创新活动的推动作用，为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

14. 我国技术进步路径及方式选择的研究述评

余泳泽（南京财经大学），《经济评论》2012 年第 6 期

从我国技术进步的路径选择的评述出发,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分析我国技术进步路径选择面临的主要争议并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不仅可以使我们深刻认识到我国在技术进步路径选择上面临的“两难困境”,而且还可以为我国制定科技发展战略提供一个具有理论和实证基础的指导框架。

后发优势理论认为引进技术是后发国家进入工业化进而获得高速发展的首要保障因素。但是在发挥技术后发优势的过程中,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是否存在着技术差距收敛则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会存在“均衡技术差距”;第二种观点认为技术赶超会出现“蛙跳”。

在现实中出现了大量技术进步后发优势悖论的例子,所以众多学者开展尝试去解释这种技术后发优势悖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引进的适宜性”(Basu and Weil, 1998)、要素禀赋的匹配问题(Acemoglu and Zilibotti, 2001; 林毅夫、张鹏飞, 2006)、“金融市场效率”以及“妨碍技术吸收的各类技术壁垒”(Parente and Prescott, 1994)等因素的分析上。

关于我国技术进步路径及方式选择的研究现状,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着较为鲜明的争议。在理论层面,主要表现为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要素禀赋说”与竞争优势理论的“技术赶超说”之间的争议。在实践层面,主要表现为技术引进以及在此技术上模仿性创新与自主创新之间如何选择的争议。

以林毅夫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按照比较优势理论下的要素禀赋说,我国技术进步路径应该采取要素禀赋升级带动技术升级的“渐进式”技术进步路径。

以郭克莎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坚持遵循竞争优势下的“技术赶超论”。他们认为如果长期坚持比较优势,我国将错失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机遇,与国外经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将越来越大,不利于我国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按照竞争优势理论下的“技术赶超论”,我国技术进步路径应该是将比较优势动态化,进而转化为竞争优势,让部分领域走从技术引进、模仿性创新到自主创新的渐进式路径,让另一部分领域走自主创新的一步到位式技术进步路径。

在我国技术进步路径选择的理论争议后,更多的研究开始向实践领域展开,由此引发了“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方式选择”之争:技术引进为主导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模仿性创新说是基于我国仍然是一个技术后发国家的基本国情,认为我国目前最可行的技术进步路径及方式应该还是以技术引进为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模仿性创新和二次创新;而自主创新说则认为长期依赖技术引进不仅会造成我国技术依赖性加强,而且由于存在一个均衡的技术差距,我国将难以实现技术和经济赶超。随着我国技术引进已经在事实上缩小了与国外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通过技术引进获得的收益越来越小,只有通过自主创新才能获得更大的收益。所以,持有自主创新观点的人认为我国应该有层次、有选择地实施自主创新战略。

现有文献研究的不足在于:第一,已有研究基本上没有考虑我国要素禀赋非均衡分布的典型特征,地区技术进步路径及方式不可能采取“一刀切”的战略;第二,没有考虑我国传统

产业和新兴产业并存的“二元”特征，产业技术进步路径及方式不可能采取一致性的战略；第三，已有研究基本上没有将技术演进的动态性和技术进步路径演进的动态性相结合，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争议停留在静态比较的范式下。

所以，未来的研究应该从我国要素禀赋的非均衡性特征出发，讨论不同地区技术进步路径及方式的差异性。在产业技术进步路径选择上，将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发展相结合，探讨产业技术进步的“二元性”。在研究中将技术演进的动态性和技术进步及方式演进的动态性相结合，力争为我国实现“多元化”、“层次性”技术进步路径提供理论和现实指导。

15. 技术会影响经济周期吗？

潘维军（上海财经大学）

《一般通用技术与经济增长的国外研究综述》，《经济评论》2012年第6期

技术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毋庸置疑的现实。几十年前的人们想象不到今天可以随时随地的通话，可以与地球另一面的人实时的交流，可以一群人在一个虚拟环境里实现自己现实中不能实现的幻想。这一切都源于技术的重大突破，这种重大技术变革，在经济学中称为一般通用技术（GPT）。

GPT 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GPT 对于经济周期同样存在重要的影响，这也许出乎人们意料之外——技术会影响经济周期？普通人的理解，经济周期基本上都是与金融市场的泡沫破灭引起的，技术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怎么会与经济周期联系起来？但是，经济学家经过仔细的研究，确实发现了 GPT 与经济周期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GPT 具有更高的生产率，但是，现代工业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仅仅单一的 GPT 并不能实现生产率的提高，还需要开发新的设施与 GPT 配套，这种开发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在这段时期，资源从生产领域转移出来进行互补性的投资，相应地，在这个时期，生产会出现停滞，利润也会随之下降。与 GPT 配套的设施开发完成并投入生产之后，就会迎来生产率的提高和利润的上升。

经济学家进一步研究了 GPT 引起的经济周期的特征。作为一项全新的事物，GPT 的出现并不是马上被广泛接受的，企业界一开始并不熟悉如何应用 GPT 来提高生产率。而且，在过去的时间内，已有的技术在长期使用过程中积累了庞大的资本设备和专门知识，如果采用新 GPT 就意味着要放弃，在新的 GPT 的前景并不明朗的情况下，企业家为是否放弃旧技术的设备和知识而犹豫。这导致了经济增长的下降。

在采用新 GPT 之后，除了需要开发与之配套的设备，还需要相应的操作知识和经验，而这种知识和经验需要时间积累。在这种积累没有完成的时候，新 GPT 的效率不能有效地发挥，与已有的技术相比并没有生产率的明显提高，在这段时期内经济增长缓慢。只有在不仅是配套的设备开发出来，而且相应的知识和经验积累起来，新 GPT 才能发挥出全部的潜力，显著推动经济增长。

从劳动力的角度来看,当 GPT 刚被企业采用之后,所使用的工人仍然是旧生产部门的工人,这些工人具有丰富的旧技术的操作经验,在旧技术部门具备很高的生产效率,但是新的生产部门,这些经验就无用武之地了。新的经验需要重新积累,在工人形成新部门的生产经验之前,新的 GPT 部门的生产效率并不比旧部门更高。所以,从宏观上来看,就会出现经济增长停滞。另一方面,新技术需要的科学基础知识更多,由于新 GPT 能够提供更高的收入,所以一部分旧部门的工人选择退出劳动市场,进行继续教育。这使得劳动力市场收缩,从而影响宏观经济增长。

最后,还有一种经常被忽略的情况,就是经济核算引起的经济增长的下降。由前所述,新 GPT 吸引部分资源转入与 GPT 配套的开发,这种创造活动并不计入国民核算中,这导致核算的 GDP 下降;另外更重要的一个方面,由于具有更高的生产率,GPT 将降低已有的、体现旧技术的资本的价值,引起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加速折旧,经济核算中不能及时调整以反映 GPT 导致的加速折旧,从而低估了实际产值的下降。

总之,作为具有广泛应用的重大技术变革,GPT 不仅能推动经济增长,还会影响经济周期。这对于科技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何在保持快速经济增长时降低经济周期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16. 经济波动福利效应的研究脉络

丁志帆 孙根紧 (西南财经大学)

《经济波动福利成本研究述评与展望》,《经济评论》2012 年第 6 期

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打破了“市场万能”的斯密神话,为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治理敲响了警钟,确保经济平稳发展由此成为凯恩斯主义者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2008 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再次让公众饱受经济波动之苦,也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决心。经济波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生活?经济稳定政策对提升国民经济福利真的有效果吗?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争议纷呈。凯恩斯学派认为,一国经济波动的根源在于由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引致的生产相对过剩。当国民经济处于非瓦尔拉斯均衡状态时,适时、适度的经济干预能够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经济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使国民经济福利得以有效提升。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认为,一国经济波动主要源自于技术冲击。经济波动是“理性人”对外界扰动最优反应的综合表现,资源配置并不具备帕累托改进余地,此时政府干预经济运行对国民经济福利提升并无裨益。1987 年,卢卡斯(Lucas)以美国消费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其结论是经济偏离平衡增长路径并非十分严重的问题,政府为平抑经济短期波动而制定的反周期经济政策并不能有效提升社会福利水平。这就是著名的“Lucas 论断”。

然而“Lucas 论断”的得出是建立在一个高度简化的经济模型——Lucas 基准模型之上。这一模型对现实经济特征的刻画过于粗略,致使诸多学者对“Lucas 论断”产生质疑,这也

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拓展空间。在后续研究中，一条思路是通过修正 Lucas 基准模型，或采用替代性消费数据来检验“Lucas 论断”，这就是所谓的狭义经济波动福利成本研究。另一条思路是通过在研究过程中考虑更多的现实经济因素，来展开经济波动的福利效应分析，我们将这类研究称之为广义经济波动福利成本研究。

在狭义经济波动福利成本研究中，一部分学者在卢卡斯（Lucas, 1987）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引入更为现实的消费者风险偏好状况和消费稳定状况，来重估经济波动的福利效应。另一部分学者则利用个体层面或跨国层面上的消费数据，以替代美国总体层面上的消费数据来检验“Lucas 论断”。研究发现，消费者的风险厌恶程度越高，在经济波动中蒙受的福利损失越大；相反，那些更为偏好风险的消费者则会在经济波动中蒙受相对较小的福利损失。在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往往要比发达国家的民众蒙受更多的福利损失。就一国而言，经济波动会使穷人蒙受更多的福利损失，因此经济稳定政策往往会使穷人比富人获益更多。这些研究的测算结果虽然有所提高，但总体而言，其结论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Lucas 论断”。

在广义经济波动福利成本研究中，研究人员不再局限于对 Lucas 基准模型的修修补补，或者对“Lucas 论断”的再检验。他们基于内生增长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和行为资产定价理论等创新性思想，分别从资本市场完备性、消费群体异质性、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的交互性、小概率灾难性事件以及主观幸福感等方面展开研究。这些探索性研究进一步深化了经济波动的福利效应分析，也更为客观地刻画了真实世界中经济波动对社会公众福利状况的影响。

在经济学中，效用不仅来自于所消费的商品或服务，也来自于所享受的闲暇时光。然而，现有研究仅仅看到了消费带来的效用，而忽略了观光、度假、聚会等消遣活动所带来的人生幸福感。因此，关于人们在经济波动中的劳动-闲暇决策如何影响自身福利状况，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领域。其次，人们的福利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受其财产状况的影响，而财富不仅来源于当期收入，也受制于现实中财富代际间的转移状况。由此而来，利用多期动态模型将财富的代际转移可能性引入经济波动福利效应分析中，以更好地拟合现实经济特征，也是未来研究的一个可能方向。另外，在经济波动的福利效应分析中，考虑真实的消费流分布状况也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

17.降低企业税收负担，我们应从何做起？

吴祖光（西安理工大学）、万迪昉（西安交通大学）

《企业税收负担计量和影响因素研究述评》，《经济评论》2012 年第 6 期

税收是国家凭借公共权力，按照法律所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强制地、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方式。依法纳税、依法治税是税收法律价值理性的集中体现。作为税收政策的核心，税收负担体现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利益分割关系。在国家与纳税人权利不对等，政府权力缺乏有效约束的情况下，税收负担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与企业博弈的结果。博弈的前提是财政

收入不能减少, 税收指标必须完成。在财政收入放缓的情况下, 征收过头税等现象杜而不绝, 依法治税大打折扣。税收负担不能简单决定于名义税率。国家税制结构具有复杂性, 企业层面税收数据的保密性, 导致税收负担只能推断, 不能证实, 从而增加了比较不同国家和企业税收负担的难度, 导致税收负担成为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 也就有了“税收痛苦指数”排名之争。

确定一个简单科学的衡量企业税收负担指标, 增加企业税收负担的可比性, 可以为有效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提供参考。然而, 目前广泛使用的企业税收负担计量指标产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 它们或者受特定会计方法限制, 或者只涉及所得税。在会计系统提供信息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 这些方法表现出很大缺陷。国际会计准则在世界的推广, 为构建可比的企业税收负担指标提供机遇。利用现金流量表提供的企业支付的各项税费信息, 结合利润表信息, 计算企业单位营业收入、单位营业利润承担的税收费用等指标能够可靠衡量企业税收负担, 从而解决不同国家的企业税收负担、不同企业的税收负担可比性问题。

在有效计量企业税收负担、解决税收负担可比性问题的基础上, 探究影响企业税收负担的因素以及具体影响机理, 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降低企业税收负担。企业自身特征自然成为首要考察的影响税收负担的因素。齐默尔曼认为规模大的公司受到公众关注度程度高, 实际税收负担也越高。而西格弗里德则认为大公司有更多的资源进行税收筹划与政治游说, 实际税收负担较低。负债利息可以税前扣除, 企业负债越高, 税收负担越低。固定资产折旧均通过成本费用在税前扣除, 因而能够降低税收负担。存货通过结转进入成本影响企业税收负担。盈利能力强的公司, 应该有更多的应税所得, 导致税收负担较高。上述这些逻辑在经验研究中并没有得到一致的验证, 企业规模、负债水平、资本密度等企业特征如何影响税收负担尚无定论。究其原因, 企业也是身不由己, 企业赖以生存法律、制度环境严重制约着其税收负担。威尔基发现名义上降低税率并不能有效减轻税收负担, 企业的避税行为、税收征管的强度等因素使名义税率往往难以真实反映企业的所得税负担程度。发展中国家往往利用税收优惠推进其产业政策, 因而产业政策成为影响企业税收负担的重要因素。在以关系为基础的国家, 政治关联可能会为企业带来税收好处, 从而减轻有效税率。政府可能让国有股权比例高的企业承担了更多的税收负担, 但政府持有公司股份也可能增加公司的游说能力, 从而降低税收负担。具体制度情景和企业自身特质相互作用, 对税收负担产生影响。

政府与企业通过税收征纳关系成为利益相关者, 政府干预、法律执行过程、企业决策行为、要素和产品市场约束等因素会影响政府与企业利益分割关系。特别是在法制不健全的环境下, 环境因素可能独立影响企业实际税收负担, 也有可能通过影响企业自身特征影响到实际税收负担。因此, 实施结构性减税, 降低企业税收负担, 需要从依法治税, 降低税收征收过程的随意性入手。改善企业面临的税收环境, 通过塑造一个透明、可预测的税收环境, 降低税收带来的不可知因素对企业决策的冲击, 增加企业决策的弹性, 保证企业可以通过合理的决策, 降低额外税收负担。否则, 企业并不能从降低税率等减税措施中得到实际好处, 减税政策也达不到降低企业税收痛苦的目的。

《经济评论》简介

《经济评论》是由教育部主管、武汉大学主办的经济学术期刊，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人。自1980年创刊以来，本刊立足于中国经济实践，瞄准当代世界经济理论前沿，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现代化、本土化和规范化。本刊设有中国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研究、经济理论探索、理论前沿动态、新书评介等栏目，发表经济学领域各类学术规范、方法现代、研究深入且具原创性的学术论文和评论文章。

《经济评论》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CSSCI来源期刊。近年来，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要求和当代经济学新的发展态势，《经济评论》适时调整和更新研究主题，强调现代经济学新的研究方法，大力扶持青年才俊；另一方面，全面落实双向匿名审稿制度，进一步加大了与国际学术刊物规范接轨的力度，不断提升《经济评论》的学术质量和学术品位。

据中国知网统计，本刊的机构用户分布在27个国家和地区，如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个人读者分布在28个国家和地区。每年都有大量论文被《新华文摘》、《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术文摘》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各种期刊等众多报刊文摘转载和转摘。

根据最新出版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08)，全国经济学理论核心期刊文献计量学评价中，《经济评论》排名第4；根据最新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8)，在全国综合性经济学专业期刊的文献计量学评价中，《经济评论》位居第5。

作者可以进入本刊网站(<http://jer.whu.edu.cn>)网上投稿审稿系统在线投稿。根据相关提示操作，即可完成注册、投稿。完成投稿后，还可以通过“作者中心”在线查询稿件处理状态。本刊不收取版面费、审稿费等任何费用。

主管：教育部

主办：武汉大学

编辑出版：《经济评论》编辑部

简报责任编辑：杨丽艳

联系电话：027-68754563

E-mail: whujer@163.com
